

经济学新视角下的城市化与城市治理

——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

侯 凌

在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人口和产业不断聚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有许多研究文献表明,在宏观水平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相伴而行的。然而,不幸的是,长期以来,诸如城市化之类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和区位问题的研究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传统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主要是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什么问题,视而不见“何地”问题。

不过,在最近十多年里,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城市化和区位问题的研究文献正在日益增加,形成新一轮研究城市经济和空间经济的浪潮。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致力于将空间因素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甚至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看作是经济学研究“最后的前沿”。而且,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迈向城市化世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

成德宁博士撰写的专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作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丛书中的一册,是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简新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资助出版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从经济学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以及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纵览全书,作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自己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一、城市性质的经济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完备信息”和“资产通用性”假设,使经济学家把市场交易看成是无成本的、“瞬间完成”的活动,导致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既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也缺乏有关提高交易效率的组织演进的分析。例如,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企业

基本上被视为一只“黑箱”,被简化为生产函数,即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前提下的投入产出关系,企业的性质、企业存在的原因、企业内部结构等长期以来都没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同样,由于没有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城市也如同企业一样,成为城市经济学理论中有待揭示的另一只“黑箱”。传统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对城市问题的分析,而恰恰忽视了对城市性质的分析。无论是经典的区位理论,还是人口迁移理论,都把城市的存在作为既定的假设。例如,冯·屠能是经典区位理论的创立者,他的《孤立国》主要致力于解释前工业化时期德国围绕主要中心城市的农业活动布局模式。但是,冯·屠能把空间经济中人们最希望了解的事——中心城市市场的形成和存在——放进了假定。1964年,阿洛索(Alonso)成功地将屠能的地租曲线这一核心概念运用到城市经济学分析中,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形成风光一时的“新城市经济学”。但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的焦点仍然只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释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二是分析城市问题,如拥挤、住房、就业、歧视和城市财政困难等等,其经典模型是假定在一个中心城市,有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央商务区。一条均衡的出价竞租曲线(它是中心距离的函数)同时决定了中央商务区周围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地租。这个模型实际上完全是冯·屠能模型在城市背景下的翻版。不幸的是,这个模型也只提到了有一个中央商务区,却没有解释。

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新范式为分析城市的性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成德宁博士的专著也正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对城市的性质、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根源提出了新的看法。成德宁认为,在空间地理上,城市的性质是密集性,而在经济学上,城市的性质是协调分工、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布局在城市里的厂商,其优势除了源自规模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源泉是城市里信息灵通,

相互联系快捷、频繁而方便,加上城市正规制度相对完善,信用发达,大大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因此,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与分工演进密切相关的现象:一方面,城市通过将各种要素聚集在一起,节约了运输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知识流动,创造了相互信任的制度和文化的,大大地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优势,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展。

二、城市化、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席卷经济学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的理论革命:首先是新产业组织理论,创立不完全竞争模型;然后是新贸易理论,建立了收益递增下的国际贸易模型;第三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收益递增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第四则是新经济地理理论,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经济的空间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中,收益递增成为核心的假设,解释收益递增的源泉也是各种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不过,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通过两种思路来解释收益递增:一是认为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人力资本和知识外溢效应;另一种思路是将收益递增归因于劳动分工的演进。而成德宁博士的专著主要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收益递增的源泉,重点对城市化、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德宁博士认为城市化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从以下两个方面带来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

(1) 城市化、知识外溢与经济增长。成德宁博士对城市化与技术创新、知识流动、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上论述了城市化促进知识外溢,带来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的机制,指出技术创新和知识外溢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个体和企业之间知识流动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因此,人口和产业聚集(城市化)可以促进知识的流动,带来创新和增长。

(2) 城市化、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成德宁博士指出,城市化与劳动分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自我循环演进的关系:首先,劳动分工是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也是城市化的基础,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没有分工的深化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城市化就失去了持续推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分工水平主要受交易效率的限制,而城市化则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化通过把人口和产业聚集在一起,创造出大规模的市场,降低了协调交易活动的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推动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和深化,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三、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

近年来,各国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均意识到大多数国家的财富是城市地区创造出来的,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更有活力,城市也不再被看作是吸纳国家资源的“黑洞”。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术和政策研究的主流开始从防止城市过度膨胀转向城市治理。

在21世纪初,我国将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地区。如何为流入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住房、医疗、卫生、供水、供电、社会安全等基本服务,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社会融合,防止城市社会的分裂,防止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城市病”和“城市危机”,这无疑是我国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成德宁博士在书中提出,决定城市未来命运的是城市的竞争力和生产力,而城市竞争力和生产力除了受国家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框架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更主要取决于城市治理和地方性的公共政策,城市治理水平决定着城市的前途和命运。针对我国城市管理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缺乏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区民主参与的现实,成德宁博士提出我国城市管理要“多些治理,少些统治”的观点,主张建立政府公共部门、非政府部门和市民共同参与的“参与式城市治理”新模式,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城市建设中出现“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确保市民的需求得到优先满足,也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为此,成德宁博士的专著还对影响我国城市治理能力和城市发展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如城市人口管理政策、城市土地政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城市产业发展政策、城市反贫困政策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创新的思路与对策。

注释:

Henderson, V., 2000. "How Urban Concentration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26,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0.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p125. Internet: <http://www.worldbank.org/wdr/2000/fullreport>.

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文版,2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

Krugman, P., 1998.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2, Issue 2, pp. 161 - 174.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文版,57、58~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成德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19~2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N)